

東方研究

一九九九年

北京大学 东方学研究院 编

蓝天出版社

东 方 研 究

一九九九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

主 编 张玉安

副主编 赵 杰

编 委 唐仁虎 李 强

李 政 林丰民

蓝天出版社

1999年7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研究 1999/张玉安主编 . -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9.11

ISBN 7-80081-889-6

I . 东… II . 张… III . 东方学 - 文集 IV . K1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694 号

东方研究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编

蓝天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984244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45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081-889-6/G·469

定价：20.00 元

目 录

序文：为新世纪奉献的一束东方学之花 (1)

一、文化理论

- 论新世纪东亚民族精神的升华 赵杰 (11)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现代化 仲跻昆 (22)
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上的中缅文化
交流 汪大年 (46)

二、社会科学

政 治

- 近现代海湾六国阶级结构的变迁 吴冰冰 (59)
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的崛起 梁雅卿 (72)

经 济

- 缅甸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形势评述 姜永仁 (87)

历 史

- 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蒙古妇女 吴新英 (103)
《蒙古秘史》研究初探 张吉焕 (110)
伟大的女性，美德的化身

——《蒙古秘史》中的诃额伦形象 王浩 (123)

- 自由泰运动与战后泰国地位 傅增有 (134)

民族宗教

- 当代巴基斯坦信德省民族矛盾 孔菊兰 (148)

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匮乏与东西方宗教意识的

苏醒 林丰民 (170)

试论印度教性力派产生发展的文化根源及影响 ... 郭童 (181)

三、人文科学

语言文字

试析阿拉伯语四字母原生动词

——关于阿语辅音的研究兼及阿语“词族”

的建立 施光亨 (194)

泥板书屋 拱玉书 (206)

从越南喃字诗歌的语言表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 傅成勋 (220)

阿拉伯语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 谢秩荣 (235)

整体协调 动中求衡

——关于阿拉伯语教学途径的思考 张甲民 (250)

文 学

班基故事在东南亚 张玉安 (260)

初论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语文学 孔远志 (278)

90年代的蒙古文学 史习成 (293)

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东南亚 林琼 (312)

李箕永评传 何镇华 (328)

《雪国》与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情结

——兼谈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向 李强 (342)

蒙古萨满神话简论 陈岗龙 (359)

中国的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及其原因 唐仁虎 (367)

杜甫与高丽、李朝诗论 [韩国] 李京美 (376)

综合

菲律宾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与影响 吴杰伟 (387)

文化堆积层中的维吾尔人、维吾尔语 刘亚敏 (398)
谈喀尔喀人的传统服饰 姚克成 (412)

书 评

从《东方研究》看东方文化 冯前进 罗晓春 (425)

为新世纪奉献的一束东方学之花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在喧嚣的现代化尘世中静心体会一下时间长河的律动时，20世纪末的现代人似乎聆听了新世纪那空谷足音般的脚步声。21世纪终于以倒记时的形式向我们走来，或者说，我们正在激动不已地向她走去。作为世纪之交东方大国的中国人，我们在体会千年跨越的神圣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十多年来人类为跨世纪而做的各种精神准备，尤其是文化理论上的时代论。

站在时空跃迁的文化潮头上的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教授，他老人家曾在十多年前把世界文化归而为四：

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括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和发展）；

印度文化体系；

古希伯莱、埃及、巴比伦、亚述以及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

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

季先生又把四种文化进而归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指出，西方文化强盛了几百年，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东方文明，转折将从21世纪开始。并借喻了中国有名俗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象说明人类文明交替演变的过程。

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为主题引发了十年来的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讨论，一些人支持季先生的观点，可没有什么新的阐述和发挥；一些人反对，认为西方现代化仍然占主流，包括经济科技和强权政治等；另一些人不置可否，但顺着冷战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而自然推理为，21世纪的文化主流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而是多极的。

到了新世纪马上莅临的今天，东方文化在新世纪的主流作用已初见端倪，但至今在一些人的认识中还不甚清晰。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三十年河东和三十年河西的理论加以创新性的理解。

从历史事实看，自人类完整地掌握炼铁业和熟练地使用能广泛交流的文字起的三千多年文明史中，按每千余年作为一个阶段来分析世界文化的发展，公元前至公元后一千多年的漫长农业文明中，人类和自然界保持着和谐一致，在东方文化中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孕育了以恒河流域为高峰的东方上古印度文明，产生了以汉唐文化为鼎盛的中国封建文明。农业文明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及文化大师的名字，如佛教和释迦牟尼，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特别是儒学和孔子、孟子，他们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经伦文化，首先在东方称雄，以后逐渐流向西方。这可谓“三十年河东”。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的第二个一千年，西方慢慢走过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长夜，并逐渐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来补充自己。在之后的文艺复兴中使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人性的解放带来了经济上的工场手工业，以物质生产为欲望的工业革命从此在西方全面地展开了。随着工业发展的日渐繁荣，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内核的弱肉强食式的竞争精神，以人类为中心的征服自然的开发开拓精神逐渐定型化，发展成了高度发达的近现代工业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现代化和商品价值观全面冲击世界各个角落。近一二百年来，也强烈地影响着东方各国。这可谓“三十年河西”。

可是，进入本世纪后半叶以来，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西方首先产生后现代主义，以消解意义为主来对物欲横流的人生玩世不恭。精神空虚，人情冷淡。只重过程不讲目的，只重现实不讲未来，只重实用不讲情义，只讲征服不讲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愈益激化。环境污染，河流干涸，田地沙化，森林缩小，生态失衡。人类盲目地“杀鸡取蛋”，把一个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的世界留给下一代，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千年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西方文化的物质现代化加上人际竞争哲学和天人的征服哲学如果继续强化而不克制，世界的灾难就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西方文明在物质现代化上做了不少有效的调整，如绿色工程，保护生态，知识经济等。但根源于物质现代化背后的精神理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自行取消。这种矛盾只是转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征服上，最终导致的仍是有限的世界内的人与人的矛盾激化，有限的地球资源内人对自然的无限制地掠夺。面对 20 世纪末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危机，包括西方朝野人士在内的整个国际文化界又青睐起东方文化中人际和谐，“天人合一”等理论了，强调起法律文化背后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了。再加上近 20 年东亚日本、“四小龙”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去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亚洲国家快学西方导致经济过热，中国提前宏观调控，就顶住了危机，况且，别的国家的危机也只是前进中的小插曲）所借助的文化力量，就更使人们垂青东方文化了。铁的事实一再证明，以东方精神文明为基底，以中国经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崛起，说明“三十年河东”的时代又将来临了。而这个来临的起点正是 21 世纪开始的新千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为什么和世纪发展的时代状况如此巧合呢？这是因为，“河东河西论”实际上代表了人

类社会发展史观中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它看似静态机械，实则是动态变化的认识论，它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在文化时代论上的反映，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发展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以千年为发展阶段的东西方文化，正是这种类似物质对称的两极交替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至。有人说，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是自然科学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文化理论的一种自然反映。也可以理解为，20世纪是“对外”的世纪，21世纪是“对内”的世纪。就文化理论本身来说，20世纪则是人类工业文明走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世纪，是竞争和征服的“对外”理论发展到极地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生态文明开始的新纪元，是在原农业文明时代“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理论的基础上的再提取，是在吸取了工业文明经验教训之后的再升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我，找回生命意义和精神支柱的“对内”理论大发展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诸多方面研究广泛的东方文化即东方学，就成为非常必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了。

二

本期的《东方研究》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综合、书评等角度研究东方各国的文化，为新世纪东方（“河东”）文化理论的崛起提供鲜活的思想、经验和丰富的材料。全书一共31篇论文，为便于读者阅读，这里先梗概介绍如下：

在“文化理论”栏目中：赵杰的《论新世纪东亚民族精神的升华》对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作了梳理性的分析和理论性的建构，提取出三国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它们的综合体系正是优势互补，影响东方的文化精华。仲跻昆的《阿

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现代化》主要阐释了当今阿拉伯世界中原教旨主义和不等于西方的现代化的两种主张，指出21世纪多元世界中作为一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将要起到重要作用。汪大年的《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上的中缅文化交流》重点从地理和亲缘关系上考证中缅两国人民历史上形成的胞波情谊，把当今现状和文献史料结合起来考证中缅山水相连，先民迁徙，语言同源等亲密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缅文化上的不解之缘。

在“社会科学”栏目中：吴冰冰的《近现代海湾六国阶级结构的变迁》分析海湾国家在现代化中以石油为特征的畸形工业所带来的二元阶级结构，即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前工业社会阶级划分并存所带来的传统和现代的经济模式的矛盾。梁雅卿的《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的崛起》，指出黎巴嫩长期以来阶级矛盾，教派冲突与外国势力的争夺交织在一起，而什叶派最大的实力组织是阿迈勒运动，从中分裂出来的真主党又是现代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分析中东复杂政局及其冲突的内在原因。姜永仁的《缅甸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形势评述》分析了缅甸军人统治，外行领导内行，缺乏专业人才领导者，导致经济滑坡的教训，说明资源丰富但思想不对路也不能富国的道理。吴新英的《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蒙古妇女》通过独特的社会阶层的角色嬗变，从中看出蒙古改革的悄然变化。说明发达国家有其发展的经验，不发达国家也有发展前进中的教训可资借鉴。张吉焕的《〈蒙古秘史〉研究初探》对记载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第一部书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从中证明该书是一部集历史、语言、文学于一体的蒙古族优秀的古代文化典籍，也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之一。王浩的《〈蒙古秘史〉中的诃额伦形象》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的善良、慈爱、勇敢、刚毅的形象做了分析，诃额伦作为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对成吉思汗有过决定性的

影响，这也是东方女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之一。傅增有的《自由泰运动与战后泰国地位》对“二战”时期泰国最主要的抗日爱国组织——自由泰运动的建立，活动及对战后泰国地位的影响做了探讨，从一个侧面总结东方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孔菊兰的《当代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民族矛盾》分析了种族、语言、地区、政治交织在一起的信德民族矛盾，其原因：一是经济问题，二是血缘关系，三是没有重视巴基斯坦人的总体概念。这对其他地区消解民族纠纷也有借鉴意义。林丰民的《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匮乏与东西方宗教意识的苏醒》从东西方信仰变化的视角探讨宗教意识兴起的原因。全文对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反整体性，反体系论，反二元论，反元话语的理论进行了阐释，它用消解意义，消解价值本体和真理永恒性来否定目的和理想，肯定过程和现实，这是现代主义渎神行为和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物质文明过于物欲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向宗教呢近就成了一种自然而又泛化性的世界活动。这是东西方文化研究中颇须注意的重要问题。郭童的《试论印度教性力派产生发展的文化根源及影响》通过对印度主要教派——性力派的教义、女神崇拜的分析，揭示了性力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土著文化和以吠陀文化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冲撞与融合的作用，使人们看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主要特点。

在“人文科学”栏目中：施光亨的《阿拉伯四字母原生动词试析》归纳出阿拉伯语辅音表词汇意义，元音表语法意义的规律，并结合共时、历时，从辅音和词义的联系上建立词族，不失为阿拉伯语言学研究的新尝试。拱玉书的《泥板书屋》对古代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公元前3100年这一地区使用的原始文字——古朴泥板做了考据性的研究，在古代东方文明领域做了很有意义的文字考古的尝试。傅成勘的《从越南喃字诗歌的语言表达法看中国传统的影响》分析了喃字和汉越音与中国汉字

中古音的关系，指明越南文人用唐律作诗，是因为两语结构类型相似，从语言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张甲民的《动中求衡——关于阿拉伯语教学途径的思考》通过总结几十年阿拉伯语教学的平衡经验，呼吁语言专业的每一位教师要重视教学实践和教学法，这至少代表了一种务实的声音。张玉安的《班基故事在东南亚》论证班基这个优美感人的故事，其古典文学的价值并没囿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而是在整个东南亚广为流传。着眼于地区整体研究一种文学现象，对一部作品的认识就有了广度和深度。孔远志的《初论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语文学》以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印尼群岛各国文化的交流为背景，论证了中国文学对隔海相望的印尼马来民歌的影响，特别是华人马来语文学对印尼语的贡献。史习成的《90年代的蒙古文学》通过对变革的时代蒙古文学思潮的评价，对现代主义的争论及作品与环境的关系等的阐述，揭示了蒙古现代主义文学写不完的风光，抒不完的情感。通过草原牧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千百年来游牧文化的精髓。林琼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东南亚》阐述了随华侨移民带去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对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翻译，改写，流传的中国小说，增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何镇华的《李箕永评传》历述了朝鲜现代革命作家李箕永60年的创作生涯，肯定了作者坎坷的经历对其创作思想的奠基作用。李强的《〈雪国〉与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情结——兼谈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向》探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所具有的“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性”，进而追溯《源氏物语》“物哀”的传统审美观及日本民族古朴典雅，自然逼真的风俗等，给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有意的启示。陈岗龙的《蒙古萨满神话简论》通过萨满神话解释萨满的由来，证明萨满的主要职能是为人间联络神灵，这是对北方宗教的深入理解。唐仁虎的《中国的翻译出版

泰戈尔作品热及其原因》阐述了自陈独秀首译泰戈尔作品以来的中国了解泰戈尔热的三个原因：1. 中印国情相同。2. 中国受印度文化、宗教的影响较大；3. 泰戈尔作品本身内容丰富，艺术高超。李京美的《杜甫与韩国诗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杜甫诗歌对韩国古代诗文创作的影响，甚而近代韩国文人以杜诗作为伴侣，“诗史”杜甫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韩国，从中说明中韩两国文学文化的渊源关系。

在“综合”栏目中，吴杰伟的《菲律宾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与影响》历述了菲律宾文化发展三个时期及其开放性文化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刘亚敏的《文化堆积屋中的维吾尔人、维吾尔语》首先对中亚突厥所分化出的维吾尔民族的应变、融合的特性进行梳理，进而对维吾尔语进行对应的描述，发现固有突厥成分加上汉、俄、蒙、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维语结构正好和文化特性相吻合，从综合分析中找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内在联系。

在“书评”栏目中，冯前进、罗晓春的《从〈东方研究〉看东方文化》总结了十多年来《东方研究》上的论文特点，重点对作者们的文化概念作了肯定性的概括。

三

综上所述，本期《东方研究》有两大特点值得称道。

第一：内容上有典型意义。

一些作者善于抓住东方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走在亚洲经济文化前列的东亚民族精神（和平、合作、修身、集体主义、实事求是、人情网的义理、家庭内的孝道、快进取的忧患意识等），是从东方文化中提取和升华出来的，这些精神财富不仅在20世纪末的东方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跨向新世纪继续在东方发挥其效益的同时，也会以持久适用的精神魅力吸引着西

方各国的热心借鉴。比如，介于东西方之间交叉地的阿拉伯世界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特殊地位使得它自古以来就成为世界各种势力的关注目标。阿拔斯 500 年所创造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间上正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空间上正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这种承前启后与东西交汇的特点，构成了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丰富的蕴涵。东西交流所产生的火花也将在阿拉伯世界大放光明，因此，阿拉伯文化的复兴也将在 21 世纪受到国际社会的热心关注。

一些作者善于抓住敏感问题深入研究。比如，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矛盾原因的分析。不同宗教文化冲撞、互补、融合的成功经验。西方后现代主义反馈出的物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等。即使是比较稳定的人文科学，也有了不同的研究角度。比如，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进行研究，选定有跨国影响的大作家（如泰戈尔）进行研究等。

第二：方法上有创新意义。

这期《东方研究》的论文大都注意到了方法论的改进。表现有三：

从一国一族的研究走向一个地区的跨国或多国现象的比较。比如，中越诗歌语言的关系，中韩文学的影响关系，中印文学文化交流关系等。东北亚三国的民族精神，海湾六国的阶级结构，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学影响等。

不少作者注意到了对论文的理论建构，开始了理论提取的尝试。比如，对东亚民族精神的文化理论的提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复兴与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对后现代主义意义匮乏的理论反思等。

一些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对现象的单纯描写，而是注意到了对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探索，从中寻求东方各国文化现象发生的起因和发展的规律。比如，对缅甸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的直接探索，

对巴基斯坦少数民族矛盾的起因的分析，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品的特色分析，对中东复杂政局及其冲突的探因，对中国泰戈尔热的原因分析等。

本期的作者们在论文的技术处理上也大有改进。论文的写法日益规范化，尤其是，各种语言的例证一律改用了拉丁字母转写，甚至是国际音标，显示了东方研究作者群的素质。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东西方文化千年嬗变的世纪之交，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时代，东方研究真的是走出了文化苦旅，迈上了历史使命所赋予的凝重和辉煌，研究广义东方文化的东方学，有着“今人难见古时月”的神秘，也有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内涵，更有着“春来江水绿如兰”的生机。需要天清人和的新世纪，为东方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广阔天地，也为东方学者提供了绝好的建树良机，愿海内外同仁和读者加进我们的研究行列，共同在东方文化的学海中遨游，在东方精神文明的园地中漫步！

论新世纪东亚民族精神的升华

赵 杰

一、多极竞争的世纪呼唤“和”中进取的精神

21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响彻在我们的耳际，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烽火台上俯视着跨越过的年轮足迹并瞻望着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新纪元时，我们的心情是激动、冷静而又复杂的，人类这一里程碑似的跨越决不仅是世纪的交替，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文明形式的跃迁，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螺旋式的升华。

以铁犁为标志的农耕工具使人类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漫漫长夜，原始部落第一次走出了集体的族群，走向了一家一户索取物质资源的农牧天地。在原始部落的大集体向一家一户的小集体相对分化的过程中，人们谱写了“五亩之田，树之以桑”的田园牧歌，树立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农业文明的大同理想。

蒸汽机的轰鸣划破了田野牧歌式的宁静，新的生产工具启动出巨大的能源，人类的本体活动方式进一步分化，以《鲁滨逊漂流记》为特征的个人奋斗、以美国开发西部为代表的征服精神，转化成自由女神像旁的现代城市和凯旋门式的物质自豪，科学分析指导的生产和“分工更具效率”的哲学引来了工业文明的新曙光，也随之出现了人和自然胶着争雄，人际之间弱肉强食的“适者生存”。